

家 国

房山常氏家族
与近现代中国

赵广军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家国：房山常氏家族与近现代中国

赵广军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国：房山常氏家族与近现代中国 / 赵广军著.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649-2039-5

I. ①家… II. ①赵… III. ①家族—研究—房山区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0063 号

责任编辑 朱春华

责任校对 辛豫杰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401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论	(1)
一、近代家族史研究学术检讨	(2)
二、中国传统家族的近代转型	(12)
第一章 近代房山社会概况	(18)
一、近代房山社会	(18)
二、近代常氏聚落:良各庄村、周口店村、洪寺村	(25)
第二章 地方精英:房山望族常氏士人群体及其社会网络	(37)
一、世系	(40)
二、人物	(58)
三、姻戚谊友等社会关系网络	(88)
第三章 绅士、绅董与绅权:常氏家族的区域性影响	(121)
一、常氏与近代周口店煤矿的开发	(124)
二、云峰书院:常氏家族与房山地方儒学、基础教育	(142)
三、晋豫赣:常氏家族与宦游地社会	(153)
四、常氏家族的地方文化建设	(155)
五、常氏与房山地方社会的近代化	(156)
第四章 经世致用:常履道与豫、赣、直等地方社会	(161)
一、警校提调:常履道与近代河南警务教育建设	(167)

二、多任知事：常履道与近代河南赈济、社会治安	(177)
三、茶税局长：常履道与江西浮梁茶业	(188)
四、文人本色：常履道与房山文化建设	(193)
五、地方绅士：常履道与直隶赈济	(198)
第五章 家族精英的近现代转型：常氏与现代中国高等教育	(204)
一、近现代新式教育与常氏知识分子群体	(205)
二、常氏家族与高等教育之互动	(226)
第六章 从区域到全国：近现代家族影响力模式探究	(284)
一、地方社会控制：近代地方社会中的宗族与绅权	(285)
二、“经世”精神：近代家族中的知识传承	(293)
三、知识转型与近代知识分子职业化倾向	(300)
四、家族的变迁与社会变革：常氏家族式微中的更生	(312)
附录一 房山常氏人物史料摘编	(319)
附录二 房山常氏人物著述摘编	(347)
附录三 房山常氏人物著述列表(部分)	(381)
参考书目	(407)

绪 论

中国近现代一个家族的百年史就是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房山常氏在近代家族史中算不得有影响,充其量不过为一个有区域性影响的家族,但是其家族的百年变迁,却时时、事事与时政牵扯,深受近代历史的影响,是一个难得的观察近代家族转型的个案。特别是从其家族的变迁中,能够完整地观察到传统知识分子由士人向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百多年来,房山常氏家族内部的知识转型完成了从旧式教育到新式教育的华丽转身。家族中从旧功名出身的举贡群体渐演为新式的学堂教育、学校教育出身,并以新式教育选择新式职业,这成为常氏家族向现代转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常氏家族的近现代转型,也与近现代中国家族转型的取向相一致,可以此作为探讨家族、宗族现代化处境的一个观察点。

房山常氏非近代显耀世家,其先辈仿佛我们近旁着绅衿的老者,穿学生蓝校服的学校学生,戴深度眼镜的教授。近代的国家之事,多波及家族,小言之,地方之事,如周口店煤矿之开发、铁路之兴修、房山县新式教育之勃兴对家族的生计和出路有影响;大言之,近代教育转型、政治变革、国事遇舛(如八国联军侵华、七七事变)等,对家族亦有相当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家国同构在近代的社会转型时期,能够深刻地影响着家族、宗族。一般而言,家族诸多变迁模式中,以房山常氏观之,对于知识的追求,使得该家族的影响逐渐上升,彰显出知识的力量。

一、近代家族史研究学术检讨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发展变化是研究中国农村政治变迁的不可或缺的切入点。传统中国社会中,宗族观念根深蒂固,成为一种很强的以血缘为主的联系纽带。而古代的国家观念也与家族观念相联系,所谓一家一姓的天下,实际是将父系家族观念无限扩大。在逐渐形成的姓氏文化中,逐渐养成同姓聚居的习俗,以修谱联宗的方式强化血缘意识,在各地形成了无数大小不等的同姓氏人群和族群。姓氏以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对国家的民族凝聚力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家族内部传递的文化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等特点。无论宗族概念有多少论说的分歧,但是血缘性是其组成社会群体的根本因素。

传统社会家族史的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主要领域之一,成果颇丰,特别是宗族通史、断代宗族史、宗族专门史、地域宗族史、宗族历史地位、宗族史理论等几个方面的研究较多。家族,或谓宗族是由已经分居、异财、析产的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社会组织,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以来,始终以各种变化了的形式,或松或紧地伴随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而存在和发展,构成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也折射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私空间“家”与公共空间“国”的命运维系在一起,同生共存。自宋代以来,中国宗族组织经历了大众化过程,宋以降拥有广大成员,是民众性、宗法性、自治性的合法团体,明代中叶宗族庶民化,宗族则具备相当的社会功能,构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晚清、民国、新中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变迁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表现出来的是平民式宗族制度特征,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农村的宗族制度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冲击,而呈现出逐渐衰落、流散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以来,宗族历经批判与打击、摧毁、销匿;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并未被动摇,宗族制度本身发展的惯性,使得近代宗族在缓

慢衰落的同时,又呈现出一些发展和变异的新特征,逐渐走向现代新宗族形式,进入复兴阶段。

明清以来的宗族组织有三个要素^①,即族谱、祠堂和族田,所谓“敦睦之要有三,若祖庙,若祀产,若宗谱。其大端也,宗谱全则敦睦有其据,祖庙整则敦睦有其地,祀产备则敦睦有其资。三者相须,不可缺一”。在以祖墓、族谱及祠堂等为维系纽带所凝聚起来的家族文化表征中,周口店常氏家族缺少祠堂,这似乎与北方一般的宗族、家庭一致。在周口店常氏六门的坟地^②,我们可以看出录着家族世系的墓碑上的谱系,基地的空间布局遵循着世系排列而昭穆有序,墓地祭祀活动成为祭日、中元、清明等祭祀活动制度化并形成了以各房支的“房社会”组织^③。从常氏家族对祖先坟茔的关注之史实,也可以看出坟茔、祖坟对家族的重要意义。如良各庄

① 冯尔康认为宗族有四要素:男性血缘系统人员关系;家庭为单位;聚族而居;有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领导进行管理。而本文所列三要素是其功能上表现出来的外在要素,见冯尔康、阎爱民:《中国宗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② 周口店常氏祖墓原在周口店东山下,与龙骨山隔河相对,墓园占地甚广,始建于约清康熙时期,分布在周口店村北、河滩及东山脚下,各支祖坟面积不等,其中六门墓园占地辽阔,碑石林立。1986年乡镇开凿石灰矿,祖坟在规划的厂区内,每日灰烟弥漫,噪音甚大,考虑到祖墓受影响,四处寻觅后,在旧址附近、塔山西南已废弃的旧煤矿下寻得墓园一片。1984年3月房山县统战部同意,经中科院学部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常迥所请,留作常氏墓地之用。但是在迁移坟墓时,除六门之外,不少族人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将祖先骸骨迁出,限期过后被建设单位按无主坟墓处理,深埋地下,致使后人无法扫墓。现在祖墓多是六门之墓,成为常氏后人祭奠之所。但是现代常氏则逐渐分支各地,墓地也由周口店迁入各地,如1997年,常迥的骨灰由其子常振球从北京万安公墓迁云南观音山公墓,常氏家族在云南有一分支。

③ 以祖坟、祠堂、祀产、族谱构建起来的宗族实体元素中,祖坟在北方宗族内占有重要的特征性意义,见冯尔康:《清代宗族祖坟述略》,《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载常氏家族无祠堂、祀产(族内公产),族内关系多依靠祖坟和族谱维系,重新择选塔山祖坟,坟地内立界碑、立碑石、绘入族谱、誊抄碑文入谱、栽种坟树、订立维护坟地规则等,祖坟承担着重要的宗族认同功能,是北方宗族载体之一,也为撰谱提供实物及信息。

常守义时其祖坟已经葬三辈，在县城西北沙峪村，为了“不忍远离祖父之意”，仍于本穴内稍上三五步远开井破穴而葬。其兄常守仁也葬于沙峪之乡，“先人墓侧”，但是其子侄多按昭、穆顺序而葬，常文璐继配李氏因墓地逼仄而别葬于北庄新阡，在墓碑中频频解释诸因，可见对祖茔之在意。良各庄常氏祖坟 20 世纪 70 年代被迁平，后人的回忆中已经渐渐模糊祖坟的规模，只记得祖坟分好几支，有十几亩地，连有无墓碑都记不清。^① 祠堂能够延续并超越墓地系统，成为宗族活动的公共空间。在各种解释中国宗族的模式中，特别是北方宗族相对南方不发达的事实，宗族都可以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切入点，可以透过宗族探讨宗族与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探究中国社会的构成原理，探知中国近代转型的家族因素。

宗族分布极广泛，学术界对其的关注则主要集中于两大类：宗族史和宗法制度的研究。具体可以分为五个领域：研究宗族与政治、宗族与社会、断代宗族史、宗族发展变化规律、宗族研究方法和理论。^②

从宏观家族变迁的模式上而言，宗族可以以不同方式存在于不同的地方和社会场景，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东南和华北地区，研究方法也有较大争议。如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1958 年出版《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以政治、经济、环境为依据对东南宗族现象进行了解说，并最终形成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中最重要研究范式之一，普遍为人所接受，也引发中国宗族研究的热潮。同样是对华南宗族进行关注的有美籍学者葛学溥(Daniel H Kulp)、林耀华，马丁(Emily Martin Ahern)对台湾北部三峡溪南地区宗族进行的田野研究。但是学者们之间的研究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出现了不太相似的结论，如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的台湾村落研究对弗里德曼的宗族解说构成了挑战，美国华裔学者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印度裔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也回应了弗

① 常世儒(良各庄常氏中年最长者)口述，2014 年 5 月 25 日访问，良各庄常世儒家。

② 冯尔康：《中国的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里德曼的宗族理论解说,对本书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黄、杜两人以华北宗族构建、剖析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探讨宗族与村落政治之间关系的视角。黄宗智认为华北地区是一个封闭、内聚、紧密的村落区域,以自耕农为主,村落政治是以亲属空间决定的,鲜少设立祠堂、谷仓。杜赞奇也指出华北宗族不庞大、不复杂,也不拥有巨额财产,缺乏强烈的集体认同,但是却在农村社会起着具体的重要的作用。在规范、仪式和组织方面的特征使其成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一种典型制度。在华北大多数村落,宗族操纵着传统的政治机制。但是两位学者对华北宗族的研究仅仅以姓氏符号建构宗族,不足以反映华北村落多姓村社会事实和多次战乱导致的移民历史事实,难以洞察华北宗族的实质,因而对华北村落的复杂社会状况没有深入地解读。本书以京畿附近地区的常氏宗族从清中后期(1800年左右)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五十年的宗族史来观照,有别于学者们集中研究的东南沿海、华北地区的家族,以常姓家族的个案来观察家族发展内部的教育因素。

儒家知识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承担着凝聚家族的核心文化力,即便是对家族凝聚分化较大的宦游问题,也能以儒家传统教化使之在丁忧、致仕之际回归家族。但是到了近代,家族接受新式专业知识教育,职业的选择决定了居住习惯,改变了家族聚居习惯,逐渐分化家族空间联系,仅仅保留血缘关系,以房山常氏来看,近代由于接受新式教育者众,家族离散尤其如此。当代农村宗族意识复兴,王沪宁、钱杭、王铭铭等一批学者率先进行农村家族问题的探究,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尝试从经济因素和行政体制方面探寻农村宗族复兴的原因,或钱杭和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从文化意义上对农村宗族的复兴进行解释,或是王铭铭、朱虹《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等倾向于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宗族复兴的原因。政治结构、经济体制、社会功能、文化传统、精神心理等层面展示出的宗族复兴是多维的、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对于家族由传统向现代变迁,学者们进行的理论探讨是相当有益的。王沪宁等学者在对传统宗族和现代宗族的特点进行多方面研究、比较的

基础上,揭示了当代宗族的变化趋势,提出传统家族文化的八大基质: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稳定性。有一些观点与本书相似:血缘性的人际关系依然存在,但不再构成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正式依据;地缘关系的意义被削弱,人口的流动性在扩展;传统的礼降低到次要地位;单一的农耕方式已打破;家族的封闭性也被打破;长期的稳定性也发生变化;社会体制力量压倒宗族共同体,社会秩序在农村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村落家族文化在历史—社会—文化变革—教育变革的冲击下已经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其消解是历史趋势,恢复是特定现象。常氏家族近代的变迁也说明,家族内制度打破了以乡族为村政单位的格局,但是仍旧拥有教化权力,在诸多的维系家族存在的关键性表征(族田、墓田、族学、义庄、族谱)中,常姓仅墓田、修谱保存下来,成为宗族祭祀、维持血缘的关键因素。常氏家谱由单纯的明世系、辨昭穆的血缘世系记载转变为记叙宗族历史的典籍,其内容包括一个家族的源流、世系、迁徙、选墓、族产、族规、族人传记、家族文献等承载量更大的文献类编活动,可以承担起复兴家族史的传承。但是这种回归也无法阻止家族传统文化的断裂和现代的变迁。家族由传统发展到当代社会,原来的村居村落社会已经变化为一种弥散型的宗族关系,使得现代宗族文化的重构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族内的规范和要求已经远远不像传统社会那样发挥实体性作用。

家族史以实证的角度诠释着理论构建。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注意宏观把握家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整体形态,紧密地联系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特点,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尤其是同国家政权的关系,说明家族制度,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强调家族制度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阻碍作用。冯尔康等合著《中国宗族社会》提出宗族发展史的三条标准,即宗族领导权掌握在何种社会身份集团手中,宗族的内部结构及其成员的民众性,宗族生活中宗法原则的变化。认为宗族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先秦典型宗族制;秦唐间世族、士族宗族制;宋元间大官僚宗族制;明清绅衿富人宗族制;近现代宗族变异时代。宗族制变化的特点是逐渐削弱、民众化,政治功能减弱,社会功能转强。常建华撰《宗族志》兼顾宗

族制度的结构形态和功能形态,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宗族制度的基本内容:祖先祭祀与家庙祠堂、宗族结构与组织、族谱、族产、族学、族规,也探讨了近现代社会巨变中的宗族制度。柯昌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史》依据马克思农村公社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提出累世同居家族的历史存在问题。钱杭《中国宗族制度新探》在研究方法上作出重大改变,重新诠释宗族制度,运用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主位研究的方法,彻底改变以往宗族研究以功能探讨为本体结构的研究方法,指出从宗族派生出来的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这四种心理需求是汉族宗族存在的根本原因。对汉人宗族的范畴、规模、宗法制度、谱牒、家庙和祠堂、现代化与汉人宗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从史学界的家族研究来看,主要集中于时代段限内的家族史研究(分朝代研究如明清、近代、当代)、区域家族史研究(主要集中广东、福建、安徽、江西、江苏宗族历史态呈现较好的地区)、个案家族研究、家族史专题研究等方面,对本书尤其有借鉴意义的是宗族近代化问题的研究。

宗族近现代化的研究比较薄弱。西方学者在评述中国家族文化时,大多强调其与现代化的不相容,如列维将家族看作非现代化产物,古德认为因为传统家族势力阻碍工业化发展而随着工业化进程家族势力呈现削弱趋势,金德尔伯格认为中国家族制度妨碍现代化的一些特质,马克认为中国家族的依赖心扼杀工业化所必需的成就动机并阻滞企业发展,这些无疑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客位研究方式,依据某种范畴、标准和原则得出的结论。与之结论相似的是中国学者多年来对家族文化的谴责和否定,认为其阻碍了现代化或社会发展。从严复的“七分宗法”社会性质的判断开始,新文化人的打倒宗法社会运动,革命者所定义的族权成为革命对象,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社会停滞的宗族之因的论调,从理论和政治上否定宗族,使宗族成为被批判和打倒的对象(也有孙中山《三民主义》将宗族结合为纽带的“国族”统一作为民权的基础)。

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反思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认为宗法宗族制严重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贻害流传于现代社会。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宏观把握家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整体形态,用经济

基础和国家政权的关系,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强调家族制度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阻碍作用^①。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认为宗族生活在近现代处于变异时代,宗族制逐渐削弱、民众化,政治功能减弱,社会功能增强,具有对社会的良好适应力和生命力^②。钱杭《中国宗族制度新探》指出宗族派生出来的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四种心理需求是宗族存在的根本原因,对现代化具有调适作用^③。王沪宁以“农村政治文化结构”进行架构,从群体性质、居住方式、组织结构、调节手段、经济形式、资源渠道、生活方式、历史走向等八个方面列举家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④。学界对宗族现代化的研究,多视宗族为现实社会的对立,以负面评价为主。部分学者通过大量社会人类学的调研,选择典型性村落,结论称当代宗族与现代化农村有相适应者,也有与当下中国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标不相符合者,总的来说比较复杂^⑤。学术界对处于社会大变动的近现代宗族的研究,在21世纪才“刚刚开始”^⑥,十年后已经呈现出在宗族社会变迁、宗族近代化、城市宗族研究等方面的明显进展,特别是从区域入手探讨宗族,极大地改变了近现代宗族研究的薄弱状况,华北宗族引起人类学、历史学者的重视^⑦。

鉴于当下家族文化的复兴现实,对家族、宗族的思考,从历史传统中观察其现代的转型无疑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判断其现代性,重新评估家族的现代价值。钱杭《宗族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是一本论文集,主要从世系学为基本研究范式,对宗族发展史重要问题“传统建构与现代转

①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 钱杭:《中国宗族制度新探》,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版。

④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⑤ 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⑥ 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⑦ 常建华:《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

型”进行探索,以古代宗族形态为主,也探讨当代农村宗族的关系^①,该著《中国宗族制度新探》第七章专论宗族的现代化问题,认为宗族在现代中国会消失,会有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有延续下来的合理性与可能性,也有其现实性和可操作性^②。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专门论述家族的300年来流变及20世纪家族复兴问题,指出沿着两种途径变化的家族形态在近代家族观念有很大更新,家族与国家关系也转入新阶段,家族在社会变革中由式微到更生。家族的政治功能的衰退,社会功能彰显,是其长存现代社会的重要原因^③。吕红平《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对新中国成立后家族组织的衰落与复活的原因和影响进行探讨,并对农村现代化中的家族前景进行展望^④。周大鸣等所著《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发展》用人类学方法以大量个案说明华南地区宗族与现代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调适关系^⑤。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分析了宗族在近代诸形态的变化^⑥。

兰林友《论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⑦对华北各地祭礼习俗进行历史考察,指出华北宗族的外在物化手段和标志鲜少,但是在宗族象征文化方面比较显著,华北宗族的是表达性、文化性的(或是意识形态性的)。刁统菊、杨洲《多姓聚居与联姻关系:华北村落的另一种形态》,指出近代宗族的多姓聚居形态,前文质疑了弗里德曼对华南宗族结论,也挑战黄智、杜赞奇外显姓氏符号在华北地方社会宗族建构,两文都质疑了杜赞奇对于村落宗族聚居方式的判断。也有关注近代河北宗族的研究,如于秀萍《晚清民国以来的河北宗族述略——以河北宗族族谱为中心》,认为在河北宗族的建设上,明清与晚清到民初并没有大的断层,而多表现为一脉相

① 钱杭:《宗族的传统建构与现代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② 钱杭:《中国宗族制度新探》,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版。

③ 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吕红平:《农村家族问题与现代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周大鸣等:《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⑥ 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

⑦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承性,这一发展特色既有其外在的原因,又有它内在的原因。从清代到民国,农村宗族的变迁是缓慢的,它的迅速衰落不是制度的废除,很大程度上也不是新思想的宣传,而是由于外在的冲击。在诸多著作中,学者们注意的多是宗族制度性的现代调适,少论及宗族内文化、教育等软性特征与社会、国家的调适关系,本文尝试以家族内精英知识人的活动来揭示家族教育对家族带来的根本性影响。

宗族作为一种特殊性群体,与社会化的普遍性目标很难相容,但是对于族人而言,体现出的是其自身的历史感、归属感的需求。透彻理解中国宗族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可以明确和引导宗族实现其向现代社会规范转型、与现实生活接轨^①。本书的主旨在于:从一个家族看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嬗变,揭示出传统士大夫家族的近代化历程的若干路径。提出了近现代宗族研究的一些问题,也为近现代宗族研究又增补一点基础,补益以往近现代宗族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②。以家族史的方式呈现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宏大而复杂的历史场,研究其中构建起来的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家国关系、宗族与社会的关系,以判断家族对近现代社会的适应。与整体性、理论性等全面探讨宗族史不同,本书尝试以微知著的方式,全面梳理单一家族历史的方式进行个案式判断。问题是,单一家族所遗留文献的残缺,使得本文仅能就遗留文献呈现出来的点、面情况进行研究^③。

为本研究有借鉴价值的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历史系教

① 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② 相对古代宗族研究而言,近代宗族研究相对薄弱得多,仅有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多贺秋五郎《中国宗谱之研究》等部分章节涉及,见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③ 有学者进行古代家族个案的研究,如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1951年研究太原王氏、矢野主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研究张、郑、裴、韦等族,结论为政治地位对各族兴衰的作用,美国学者艾伯莱《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的家族史研究,特威恰特对苏州范氏宗族的研究、戴维斯对南宋浙东望族史氏族运的研究。而当代学者则尝试以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等方法进行个案研究,但是却容易忽视历史学的史实性考察。

授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所著《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这是一部跨越晚清、民国、新中国三大时期的家族史,作者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20世纪中国史,还试图探讨“家庭”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变化又怎样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的撰写方法和理念则是属于历史类的家族史著作。

业师章开沅在《〈叶家〉——世家大族变迁史的佳作》中评价周锡瑞《叶家》中文译稿时称该书“俨然构成一幅晚清民国直至1949年以来的社会生活的绵延画卷”,也指出“宗族是农业宗法社会的产物,并且构成其牢固的社会根基。严格说来,民国以后宗法制度已经趋于衰微,随着三纲之首君权的消失,其他的宗法纲常都随之动摇。由于自然经济的瓦解,工业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人口的流动性与日俱增,而安土重迁的思维定势早已淡薄”,而对于近代家族史的研究认为应该有历史学家参与,“然而宗族史与家族史的研究毕竟应该倡导,因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至今在观念乃至实体上仍然有大量遗存,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本书正是循履恩师点评其老友著作时的体会所得,进行尝试性史学研究,对房山常氏与近代中国互动中所构建“家国”情怀进行研究。科大卫也指出把宗族的历史放在地方的和政治的脉络上能够促进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①。家族在近三百年中由传统的宗法性祠堂族长制转向现代社会社团,变革巨大,家族的现代转向同中国社会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相一致,在社会变革猛烈冲击下发生应变、自变^②。在这个意义上,家与国的变迁与转型在由古代的家国一体,到近代呈现出共同的取向,家族向着民间团体方向演变,经历着从宗法性、血缘性到集体本位的群体演变脉络,异化为个人本位的血缘群体或同姓社团两个方向,至今这

^①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② 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一过程还未完成,家族与国家关系也转入新阶段:失去政治功能,凸显出社会功能^①。

近代以来,社会转型加快,传统宗族的延续态势成为检验中国社会变迁进度的一个重要观察指标。传统家族在近代的转型,不仅需要宏观之观察,更需要微观个案之剖析,本论尝试之。

二、中国传统家族的近代转型

宗族秩序是中国传统典型的政治结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传统与现代“冲突”而形成的僵化性的文化格局,使人们对具有与传统文化特征和命运相似的宗族文化也陷入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模式。历来学者们注重家族组织的政治属性,特别是在中国史学界的视野里,但是家族内部的儒学教化、知识传承可能在一些地区的一些家族中承担着更重要的作用。

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家族维系的稳定性在传统中国的契合,使中国的传统家国社会形式保持长久。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血缘关系的是姓氏。传统中国家族多聚族而居,其“婚姻半径”小,地域相对固定,在社会结构演变中变化不大。但是人口的迁移却对家族影响很大,“人口的迁移对人群内的姓氏种类和姓氏比例的改变,人群越小,影响越大”,甚至迁移也影响到种姓群体遗传结构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姓氏结构的主要因素^②。

常姓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百大姓之一,在豫晋、黑吉和陇西一带,是常姓占优势的地区。当代,常姓人群大约占总人口的0.18%,总人口大约

① 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② 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